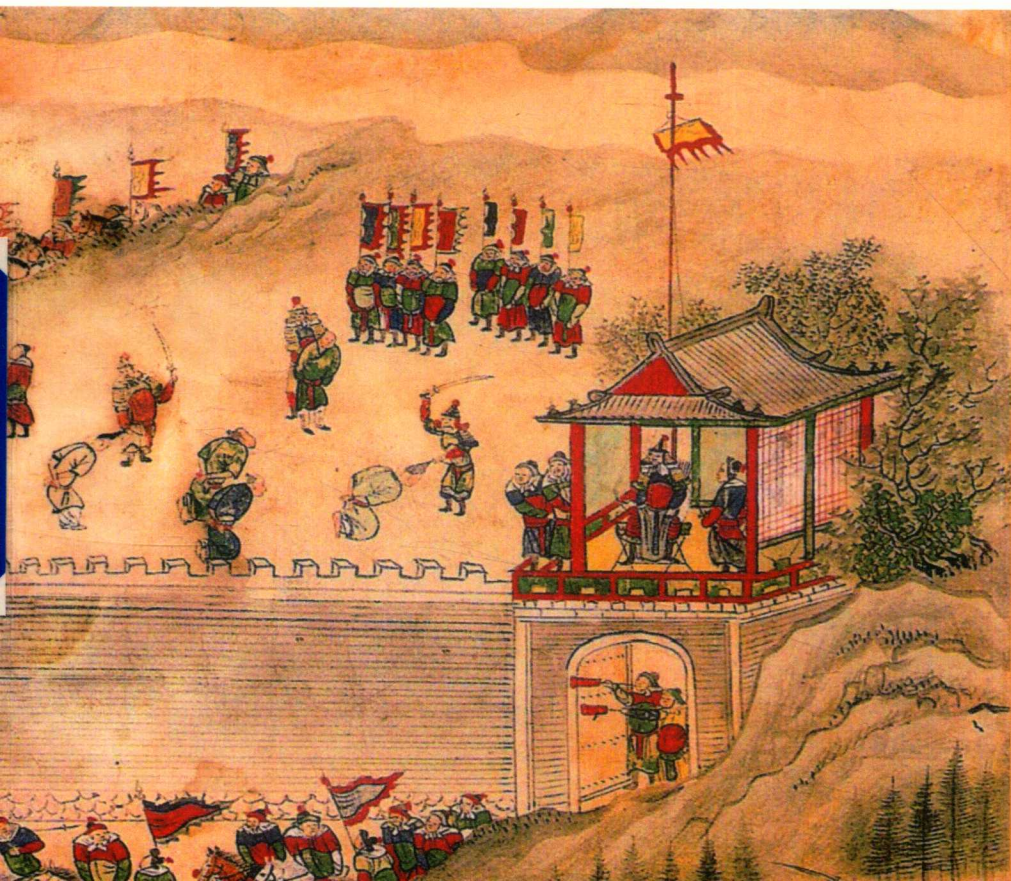


万历援朝与 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

WANLIYUANCHAO YU
SHILIUSHIJIMO DE DONGYASHIJIE

◎ 王煜焜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 东亚世界

王煜焜 ◎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 / 王煜焜著.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671-3451-5

I. ①万… II. ①王…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代②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明代
IV. ①D829.313②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6827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钱宇坤

万历援朝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

王煜焜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upress.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2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17 千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451-5/K·194 定价 48.00 元

前言 | Foreword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日本新晋贵族“天下人”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之战,至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秀吉逝世而休兵停战,前后历时七年。丰臣氏甚至因为如斯鲁莽无道的决定而失去政权,影响深远。关于此次战争的名称颇多,中国普遍称之为抗倭援朝之役、万历朝鲜之役或万历援朝之役,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等^①,而韩国则将其称为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对同一事件之称呼迥异至此,颇能说明东亚三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差异不小,毕竟对于中、朝而言是受害国家。近年来,中、日、韩学界尝试用超越一国史的角度来进行共同研究,提出“壬辰战争”的说法^②。三国学界皆向中立之研究方向前行。万历援朝之役不仅是朝鲜与日本间的战争,同时也是明朝为了援助藩国而出兵的救援行动。战争胶着之际,明朝投入十万以上的兵力^③。此外,丰臣秀吉还曾向琉球等地发送外交文书,要求其国派遣军

① 在日本,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而发动的战争的提法很多。在战争爆发时称为“朝鲜阵”“高丽阵”等。之后,江户幕末至明治初期称为“朝鲜征伐”。然而,由于日本1910年吞并了朝鲜半岛,再使用“征韩”字眼就不太妥当,为此,称第一次侵略朝鲜为“文禄之役”、第二次为“庆长之役”。

② 郑杜熙编:《壬辰战争》,明石书店,2008年。

③ 关于明军的总兵力有各种说法。丰臣秀吉第一次侵略朝鲜时,祖承训率领5000人、李如松率领43000人参战,之后碧蹄馆之战时,刘綎率领5000人增援。根据传教士弗洛伊斯的说法,当时明军的兵力据说超过20万人。(参见松田毅一訳:《完訳フロイス日本史5——丰臣秀吉篇2》第41章,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丰臣秀吉第二次(转下页)

队参战援日,而据中、韩学者的研究发现明军中包含东南亚诸国之人^①,显然这是在朝鲜半岛开展的一场搅动 16 世纪末东亚国际关系的战争。本书在一般情况下将这场战争称为万历援朝之役,若以日本的视角阐述时,则基本称为壬辰战争,或日本侵略朝鲜战争。

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变革,每次变革皆深刻影响其历史之演进。第一次是日本由原始社会发展至古代国家,第二次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动荡的百年社会至德川幕府的建立,第三次则是江户幕末的转型至明治维新的出现^②。其间,中世的安土桃山时代向近世的锁国德川幕府的转换是整个体制的收缩,且对日本国民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而源头即起自丰臣秀吉的侵略战争。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后,由于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受伤害的中、朝,日本国内出现异样的变化。关原合战后,政权改弦易辙,德川家康成为日本的“天下第一人”。面临内外交困之境,改变才是唯一可行之途。中、日、朝三方的交涉和内部局势的变化促使德川家康重新审视日本的内外方针政策。在建立德川幕府后,德川家康逐步实现了日本社会的统一与平稳发展,对外则恢复同朝鲜的邦交,且积极探求同明朝为中心的各国开展贸易。值得深思的是,经历日本混乱至极的战国

(接上页)侵略朝鲜时,根据《李朝实录》的记载,明军的水军有 92 000 人,而《日本战史朝鲜役》认为明军最少有 64 300 人。即便取最小值,两次战役,明军投入的兵力超过 10 万人当无疑。

① 参见李铉淙:《壬辰倭乱时琉球・东南亚国人への来援》。此外,郑洁西在《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一文中提到:“万历朝鲜之役的明朝军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以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为主要组成成员,其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为良好的作战能力,通过各个不同的途径被收编到了明朝军队之中,并最终来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支援朝鲜的对日作战,为万历朝鲜之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较为遗憾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如中国的《明神宗实录》和《两朝平壤录》都未提及明军中有他国士兵,主要的史料是朝鲜的《宣祖实录》。

② 参见加藤荣一:《锁国》,《讲座日本近世史 2》,有斐阁,1981 年,第 2 页。

时代,且从底层人民攀爬至国家最高权位的丰臣秀吉缘何不顾国内的重重矛盾,发动侵朝战争呢?

关于万历援朝之役历来有很多研究。日本的研究硕果累累,最为丰富。据六反田丰的统计^①,自明治以来至2005年,约有502篇相关的著作、论文诞生,而时至今日更是出现为数不少的研究。韩国自1931年至2004年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约有108本著作、393篇论文面世^②。中国方面的研究虽不及日本学界丰富,但近年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

在这些研究和一般性著述中,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原因是常常被论及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本书亦将其视为意欲解决的问题之一。撮其概要,中、日、韩三国学界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有:功名心、征服欲、恢复勘合贸易、转移国内矛盾、打造东亚国际秩序、征服明朝等。相对而言,中国学界比较认同征服明朝和转移国内矛盾的说法。二战前,日本绝大多数的研究,时代烙印严重,多出于所谓的“皇国史观”^③,一眼望去,皆是吹捧丰臣秀吉个人的英雄伟绩,意图为日本侵略周边国家作合法、合理的学术支持。战后,日本的学者从政治的束缚中逐渐松绑,研究呈现多样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史观亦出现在该领域的研究中,颇为有趣。例如,以铃木良一、佐佐木润之介为首的学者,从丰臣政权内部的构

① 六反田丰:《文禄・庆長の役》,《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二分科篇》,日韩历史共同研究会,2005年,第43—59页。

② 朴哲晔:《壬辰倭乱研究の现況と课题》,《日韩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第二分科篇》,日韩历史共同研究会,2005年,第413—433页。

③ 所谓的“皇国史观”是指明治政府以日本史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且使它担负了确立国体观念、涵养国民思想的任务。因此存在着强调符合此大目的的史实而掩饰相反的史实的倾向。学者们称之为应用史学,认为纯粹史学与应用史学自当有别,从而说服自己的学术良心。参见坂本太郎著、沈仁安译:《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造和矛盾来探究侵略朝鲜的原因,其方法的创新令时人眼前一亮,借鉴良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的研究发生变化,部分学者尝试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问题,如从东亚地域史的角度来探讨壬辰战争爆发的原因。韩国学界的结论则更多的是对丰臣秀吉个人的贬低。由于丰臣秀吉本人的一些政策和行动在当时存在莫名之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彼时之问题,故而仍然存在解读的余地。

第一章《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原因探析》,笔者拟通过对丰臣秀吉的战略、外交文书、战时议和的推进来考察其侵略的意图。首先,从战略层面看,丰臣秀吉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解。研究丰臣秀吉的专家小和田哲男认为,丰臣秀吉是十分谨慎之人^①。丰臣秀吉一生中所为最不符合其性格之事就是侵略朝鲜。若按通行的解释,丰臣秀吉出兵的对象是明朝的话,即便此时明朝由于边患和国内经济问题出现衰退的迹象,但其整体的实力仍然毋庸置疑。若丰臣秀吉希望征服明朝或是重新建立东亚国际秩序的话,必须有更为完善的战略,但纵观史料后很难发现如斯记载。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的征明计划便已是路人皆知的“国家秘密”,但日本为何屡次希冀朝鲜、琉球将征明的消息上报明朝?若丰臣秀吉确以征服明朝作为其最终的战略目标,那么秘密地准备军事后勤,在明朝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兵岂非更妙?丰臣秀吉并非无谋之辈,如此行为更像故意为之。其次,在军事层面上,丰臣秀吉所推出的系列政策亦有令人生疑之处。若以明朝为目标,是否尚有其他途径可入明朝呢?缘何丰臣秀吉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又突然公布海盗取缔令呢?以上种种,疑窦丛生。当然,丰臣秀吉或许也有解决

^① 小和田哲男:《丰臣秀吉の天下統一戦争》,《戦争の日本史15》,吉川弘文馆,2006年,第6—7页。

国内问题的考虑^①。有学者解释说这种做法体现了日本执政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②，但为何偏偏选择在这个时期发布海盗取缔令值得深究。此外，通过研究丰臣秀吉的外交文书后可发现，丰臣秀吉对整个东亚的认识和构想都源于明朝的朝贡体系，这亦是有趣的课题。最后，万历援朝之役期间的议和谈判充满奥妙，使人感到疑惑的是日军为何始终在占优之际不断请求议和？从丰臣秀吉提出的七个议和条件或可了解他对朝贡体系的重视及缘何要发动战争。

第二章《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与三国动向》，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交涉是在明军和日本诸将间进行的。战后初期的议和也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朝鲜并未真正参与。从日本的立场看，撤兵是日军在战争末期议和中最主要的目的。明军将领与日本诸将间的交涉条件在彼时制约了此后的议和进程。此外，战后的交涉同三国各自找寻本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关联甚深。因此，在研究万历援朝之役战后的明朝、日本、朝鲜的立场与态度时，无法忽视对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议和交涉的研究，并且，这是朝鲜和日本通交的前提，更是恢复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若致力于战后三国动向的研究，我们将无法规避对议和交涉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尽管如此，历来的研究却颇有不足之感。

第三章《朝鲜与日本的议和交涉及东亚三国间的政治博弈》，驻兵朝鲜半岛的明军全军撤退之举给东亚的军事、外交局势带来巨大变化。同时，这也直接促使明朝调整了东亚的整体战略。若朝鲜和日本修好一事对防范日本侵略朝鲜稍有帮助的话，意味着明朝会默认两国

① 日本学界称刀狩令、喧哗停止令、海贼禁止令等抑制私斗等法令为丰臣平和令，认为其着眼点主要是巩固丰臣政权的统治。参见藤木久志：《丰臣平和令と战国社会》，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郑櫟生：《明・日关系史の研究》，雄山阁，1985年。

的和好之举。由于驻留朝鲜的明军撤退,朝鲜与日本的和好交涉应当进入新的阶段。朝鲜于彼时的实力不足以强化军力达到防范日本的地步。“丁应泰弹劾朝鲜事件”虽然貌似告一段落,但明朝始终无法消除对朝鲜“阴结”日本的怀疑。朝鲜也认识到对马宗氏的短板,其能力不足以改变时况。基于此,朝鲜与对马宗氏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极为奥妙的“小朝贡体系”。换言之,对马宗氏抱有极大热忱致力于日朝通好的关键是受制于对马岛自身的经济环境。对马政权是朝、日两国交往的润滑剂,但他必须同时获得双方对其政权的认可才能游刃有余地斡旋于交涉中。日本政权的更替本身也提出新的政治课题,为了稳定幕府的统治和提高德川氏将军的权威性,日本需要朝鲜能派遣使者赴日交涉。三方在不断的交涉中相互找寻彼此的外交底线,进而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维持东亚国际秩序的关键。如此,通过对朝鲜和日本恢复邦交过程的研究,进而可探究东亚三国国际秩序运作的状况。

本书还收录两篇已发表和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即《博弈与牺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暴君”与侵略:西方传教士赛斯佩蒂斯与壬辰战争》和《异域的华语传承:〈唐通事心得〉与日本的华侨社会》。三篇文章同万历援朝之役有些关联,故此收入。

笔者的学力尚浅,本书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望学界各方家阅后批评指正。

目 录 | Contents

绪 论	/ 1
-----	-----

第一节 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	/ 1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	/ 5
---------------	-----

第三节 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	/ 16
---------------	------

第一章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原因探析	/ 21
-------------------	------

第一节 丰臣秀吉的情报战略、外交战略	/ 21
--------------------	------

第二节 万历援朝之役时期的外交文书研究 ——丰臣秀吉的东亚朝贡系统认知	/ 57
--	------

第三节 万历援朝之役的爆发与三国议和	/ 64
--------------------	------

第二章 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与三国动向	/ 93
----------------------	------

第一节 万历援朝之役末期的议和交涉	/ 94
-------------------	------

第二节 万历援朝之役后的议和交涉	/ 110
------------------	-------

第三节 三国议和交涉的推进	/ 122
---------------	-------

第三章 朝鲜与日本的议和交涉及东亚三国间的政治博弈 / 138

第一节 明朝的东亚战略调整 / 139

第二节 朝鲜与对马的议和交涉 / 154

第三节 派遣朝鲜使节与朝、日外交博弈 / 169

结 论 / 190

附 录 / 194

一、万历援朝之役大事记 / 194

二、朝鲜王朝官职 / 202

三、博弈与牺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 / 206

四、“暴君”与侵略：西方传教士赛斯佩蒂斯与壬辰战争 / 219

五、异域的华语传承：《唐通事心得》与日本的华侨社会 / 236

参考文献 / 263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对于万历援朝之役的研究未可称足,仍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①。台湾地区的学者李光涛是较早使用朝鲜史料来研究万历援朝之役的中国学者,史料搜集功夫极深,但囿于日本文献使用有限,故其见解尚有商榷之余地。大陆地区,冯玮主编了《日本通史》,其余涉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研究还有数篇论文。另一位台湾地区的学者郑櫟生曾负笈九州大学,专攻中日关系史,故此,其对万历援朝之役的理解比较全面,可资参考。

① 1990年,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了《壬辰之役史料汇编》,其中收录了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朝鲜)柳成龙的《惩毖录》、(日本)川口长孺的《征韩伟略》(晚出)。但这本汇编存在着收录范围过于狭小的问题,不要说没有收录朝鲜时代的许多汉文史料,就连明人钱世桢的《征东实纪》也未收录。值得一提的是,柳树人(朝鲜族)先生曾有一部遗著《壬辰抗倭战争》,于20世纪80年代编入了由延边历史研究所内部编印的《延边历史研究》第二辑。这是国内最早的一部系统完整全面研究万历援朝之役的历史学著作,从此书最后的文献附录中,也能看出柳树人先生多年来的积累。其中,他参考了120种朝鲜古籍(王室官方史录、私人笔记、文集、文献、碑文等),以及90多种日本古籍,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内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军事史研究中,亦有几部史著涉及万历援朝之役。

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一书曾提及：“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①显然，吴先生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出发，从国内的阶级、国外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原始特性等因素来看待丰臣秀吉的行动。

复旦大学的冯玮先生毕业于日本的京都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其编写的《日本通史》参考日本学界众多研究，质量可谓上乘。他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标颇为明晰，当是称霸亚洲。其言：“在平定内乱、统一天下后，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占领朝鲜，成为丰臣秀吉当时最基本的方针，其颁布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均围绕这一方针展开。毋庸置疑，在丰臣秀吉欲实现这一野心的过程中，国内政策的强制推行和外交的侵略扩张是一对难以分割的‘连体儿’……侵略朝鲜仅是手段，占领唐国（明朝）、称霸亚洲，才是其最终目的。”^②冯先生综合了诸说，首先肯定地指出统一日本社会是其侵略的基础，由此诞生的是更大的野心，朝鲜只是一个过渡，明朝也很难被定义为最终的目标，亚洲的“天下人”才是其最终要得到的结果。

1985年，南开大学的王家骅先生发表《略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一文，介绍了日本学界关于此领域研究的部分动向，且在批判日本学界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文章末尾，他总结道：“丰臣秀吉及其中央政权，主要是为了通过实行临战体制，以加强对农民和地方大名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发动侵朝战争的。当然，这并不否认，满足部

①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② 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分地方大名、武士的领土欲求和城市商人控制东亚、南亚贸易的愿望，以及实现丰臣秀吉个人的‘专制君主欲望’，也是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侵朝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原因。”^①王先生最后仍回归了传统史学的“暴君”欲望批判。

1994年，辽宁大学的孙文良先生发表《明代“援朝逐倭”探微》。该文援引了学界罕用的汉文史料《思庵实纪》，且探讨了丰臣秀吉用兵朝鲜的动机所在。他对丰臣秀吉的看法颇为负面，认为他“是个野心家和战争狂人”。对于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孙先生有不同于传统的解释。他认为必须注意的细节是日本与朝鲜的交涉，据此“就会知道丰臣秀吉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于威胁朝鲜，就是信中所说的‘贵国（朝鲜）先驱入朝’。要求他们率先入贡，或提供帮助，好像不牵涉他们自身的存亡问题。实际恰恰相反，所说进攻明朝，不过是虚张声势，内心的意图却在吞并朝鲜”^②。当然，孙先生的研究有所启示的地方在于看到丰臣秀吉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一、丰臣秀吉炮制《大早计》（处置中、日、韩的计划）的时间为侵朝仅一个月零四天之后，那时他的庵下大军势如破竹，萌发了这个狂想，或许比以前稍较实际；二、就其内容，主要是为侵朝日军化解内部矛盾，鼓舞士气，并以瓜分中国及朝鲜领土为诱饵；三、把侵略明朝放在吞并朝鲜之后，证明不以侵略朝鲜为满足，他要继续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但这只能是侵略朝鲜之后的事。”^③进一步说，“纵观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动机与目的，不能绝对否认他要向明朝挑战，进而侵占明朝领土。然而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从明朝保护之下，夺取朝鲜这块属国之地，并且是看到朝

① 王家骅：《略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日本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孙文良：《明代“援朝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

③ 孙文良：《明代“援朝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

鲜国王沉湎酒色,守备废弛”^①。孙先生对于朝鲜国政存在的弱项作了考察,换言之,丰臣秀吉之所以会对朝鲜垂涎三尺,就在于其本身柔弱不堪,当随意蹂躏。

宗惠玉和金荣国先生在《也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一文中批评了王家骅先生的观点。两位先生从张声振的《中日关系史》中转引了少量日本研究文献后认为,“加强对农民和地方大名的中央集权统治不是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农民和封建主的矛盾处于相对缓和时期。而以丰臣秀吉为首的大封建主和豪商们积极向外扩张领土是发动侵朝战争的主原因”^②。两位先生从以丰臣秀吉为首的封建领主统治阶层这个整体出发,认为这场侵略的战争起源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海外领土的渴求。然而,略有欠缺的是,两位先生将日本的统治阶层视为一个整体,这同实际的情况相去甚远。因为当时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间尚短,未能真正将不同派系的大名融合为一,若认为封建领主是铁板一块,丰臣秀吉能够代表各大势力的话,恐怕有所误读。

台湾地区的学者李光涛是最早使用朝鲜史料来研究万历援朝之役的中国学者。李先生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朝鲜王朝的“待倭之道”有误。他提出:“考倭祸原因,其故甚多,先就大概说,自然由于日本不乐太平,横挑边衅所致。但如当时朝鲜待倭不以‘待倭之道’,也是招祸一大原因。”^③对于“待倭之道”,他认为“特别是明代,异于常情,惟当断然处置,一如明祖的做法,绝之最为上策。假若说日本强朝鲜弱,力不能敌,然有大明为与国,可以恃而无忧的。可惜朝鲜当

① 孙文良:《明代“援朝逐倭”探微》,《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

② 宗惠玉、金荣国:《也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③ 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2页。

断不断,终受其祸”^①。李先生的研究打破历来从日本方面找寻原因的惯例,首次从朝鲜方面来探究缘何会出现倭祸。

九州大学毕业的郑櫟生先生专攻中日关系史,故其对万历援朝之役爆发的原因有更全面的概括。郑先生认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原因有五:出于征服欲和名誉欲而企图统一亚洲诸国;为了国内统治之策;企图编制直辖军队;日本国内的生产问题;独占海外贸易以资助国内的统治^②。然而,郑先生的结论基本是援引和概括明治以来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并未使用新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对于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原因,大多将其归咎于丰臣秀吉个人或日本统治集团的野心和海外扩张欲望,抑或是转移日本国内的矛盾至朝鲜和明朝政权上。

第二节 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

日本学界对于壬辰战争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1905年,田中义成在《史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丰太阁外征原因》的文章。他批评了当时普遍认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是突发行为的观点。然而,他同时又认为,“不世出的英雄丰公乘风云际会,于海外建立空前之伟业乃理所当然”^③。显然,田中义成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观同当时日本向外扩张的国策是分不开的,值得批判。田中义成在其后的

① 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2页。

② 郑櫟生:《明·日关系史の研究》,雄山阁,1985年,第577—578页。

③ 田中义成:《丰太阁の外征に于ける原因に就て》,《史学杂志》第16编第8号,1905年,第4页。

著作《丰臣时代史》中提出,丰臣秀吉其实一直有降服明朝与朝鲜的夙愿。之后,他又提出安土桃山时代两位“天下人”的外交理念。田中义成认为,织田信长的外交是进取、积极的,而丰臣秀吉则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外交政策,值得称道^①。通过解读丰臣秀吉给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等大名的文书后,田中义成认为丰臣秀吉要征服从朝鲜至明朝,乃至南蛮之地^②。若按照当时日本的世界观来看,日本、明朝和南蛮就是整个天下。换言之,丰臣秀吉的最终目的应当是称霸天下。然而,又有些矛盾的是,田中义成认为当朝鲜使节来到日本后,丰臣秀吉意欲“通过朝鲜与明通交,恢复室町时代的勘合贸易,可见其欲开启官船、商船之旨趣”^③。

概而言之,田中义成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勘合贸易说”。换言之,日本发动壬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与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侵略朝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朝鲜拒绝了日本的中介委托。显然,田中义成的观点是单方面地将壬辰战争爆发的原因诿过于朝鲜身上,这与其一贯的英雄主义历史观极为一致。

池内宏可说是近代日本首位全面研究壬辰战争的学者。他认为,战争的爆发与当时的大环境分不开,这个时期(战国末期至近世初期)日本国内处处横溢着向海外扩张的气息^④。因此,对于丰臣秀吉心存海外侵略的抱负,池内宏是持肯定态度的。池内宏认为丰臣秀吉产生侵略朝鲜与明朝的想法当在1582年以前。与田中义成类似,池内宏对于丰臣秀吉的个人崇拜意味强烈,因为经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亦

① 田中义成:《丰臣时代史》,明治书院,1925年,第283页。

② 田中义成:《丰臣时代史》,明治书院,1925年,第286页。

③ 田中义成:《丰臣时代史》,明治书院,1925年,第287页。

④ 池内宏:《文禄·庆长之役》正编,吉川弘文馆,1914年,第1页。池内对于安土、桃山时代的评价是“吾国国民(日本)之精神超越了国家的领域,是向外部横溢的时代。彼等向海外扩张,是开辟新天地的时代”。